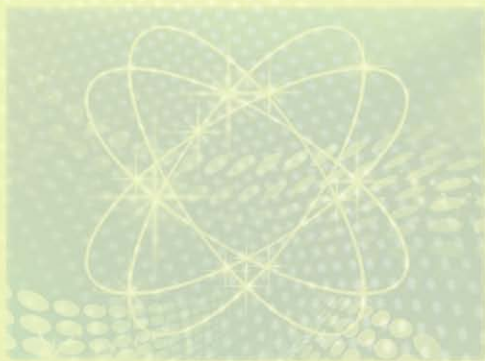


纪念罗坊会议召开
80周年理论文章集



目 录

在纪念罗坊会议召开 80 周年大会暨纪念邮册首发式上的讲话	李安泽(1)
罗坊会议的历史作用及启示.....	王新生(3)
《罗坊会议决议》述论	
——兼论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异同	蒋伯英(20)
没有罗坊会议就没有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余伯流(35)
坚持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	黄爱国 黄 洋(47)
调查研究与毛泽东《兴国调查》的成文	苗体君 窦春芳(56)
论罗坊会议精神与井冈山精神的传承关系	李 忠(66)
论罗坊会议上毛泽东“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战略	庞振宇(74)
红军战略战术原则的丰富和发展	
——论罗坊会议“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确立	李 伟(90)
罗坊会议: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一个范例.....	杨会清(97)
试论《兴国调查》的历史学价值.....	黄惠运(104)
罗坊会议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性.....	廖先明(115)

略论毛泽东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抵制与罗坊会议的成功	胡日旺(123)
论毛泽东《兴国调查》的重要历史意义.....	王晓丹(135)
论罗坊会议精神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刘 鹏(148)
罗坊会议的历史及现实意义研究	课题组成员(160)
后记.....	(187)

在纪念罗坊会议召开 80 周年大会 暨纪念邮册首发式上的讲话

李安泽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罗坊会议召开 80 周年,重温罗坊会议精神,总结宝贵经验,缅怀革命先辈,弘扬光荣传统,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积极融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加快建设国家新能源科技城”的征途中奋勇前进!中央党史研究室和省委宣传部对这次纪念活动高度重视,中央党史研究室王新生研究员为我们作了专题报告,等一下省委宣传部东有副部长和谦芳主任还将作重要讲话。在这里,我代表中共新余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各位领导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新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各级领导、同志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志们,80 年前的今天,也就是 1930 年 10 月 25 日,罗坊会议在新余罗坊陈家闹召开。这次会议是在我们党走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而遭到了“左”倾冒险主义严重干扰的情况下,为抵制“左”倾错误,坚持正确道路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及时纠正了红军和江西党内的“左”倾错误,统一了红一方面军和江西党的思想,使红军从理论和实践上摆脱了“左”倾错误,停止了进攻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行动。在罗坊会议上制定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不仅使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而且

还为第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共苏区的建立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使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罗坊会议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原则，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罗坊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深入细致的“兴国调查”，身体力行地展示了我党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向实际学习，根据第一手资料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的调查研究作风。罗坊会议所体现的“团结统一，顾全大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的思想和作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同志们，罗坊会议至今已整整 80 年了。今天，我们纪念罗坊会议，就是要大力弘扬罗坊会议留下的崇高精神，大力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以革命先辈不怕困难、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英勇无畏的革命斗志，作为引领我们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大力弘扬新时期“开放、创新、争优”的新余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紧紧咬住发展不放松，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建设国家新能源科技城，努力实现新余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同志们，罗坊会议已载入光辉的革命史册，罗坊会议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向前！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作风，真抓实干，为积极融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加快建设国家新能源科技城而努力奋斗！

2010 年 10 月 25 日

罗坊会议的历史作用及启示

王新生

今年是罗坊会议召开 80 周年，中共新余市委、市政府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我有幸被邀请参加纪念活动，非常高兴。纪念活动的组织者要我作一个关于罗坊会议的讲座，老实说，我心里没底。一是最近比较忙，为了明年的纪念建党 90 周年活动，中央党史研究室承担了中央交办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也是参加者之一，准备的时间不够充裕。二是我对罗坊会议没有多少研究。对罗坊会议的研究，应该说，江西省党史部门、新余市党史部门，都比我强得多。我讲这个问题，有点班门弄斧的感觉。这是一次我向大家学习和交流的很好机会，讲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罗坊会议的历史背景

罗坊会议在中共党史、军史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会议，但长期以来除了党史、军史专家对罗坊会议比较了解外，对罗坊会议了解的人很少。提起罗坊会议，很少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可以说，罗坊会议是一个被人忽略的中共党史、军史的重要会议。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主要是研究不够深入，宣传力度比较小。

为了说明罗坊会议的历史作用，我先把罗坊会议的历史背景作一简单介绍。

大家知道，在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是按照俄国的模式来进行的，即以城市为中心。共产党把主要力量

集中在城市,作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发展工人党员,闹罢工。然后搞总同盟罢工,发展到武装起义,占领中心城市,夺取革命的胜利。在罗坊会议召开的前一年,即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判断:“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认为中国“日益生长的高潮的象征”,“是工人运动的复兴”,“无产阶级的罢工经济斗争,是在发展着的斗争,表现着转变到政治斗争,游行示威的倾向。”由此,中国共产党“现在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争取无产阶级自发的经济政治斗争的领导。”“应当特别的注意工人的罢工斗争。配合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候,必须用全部力量,去发展政治罢工,立定准备总同盟的政治罢工的方针;应当在一切地方,只要那地方的国民党反革命政权削弱而革命斗争生长就要做革命的工会运动,走出秘密状态的尝试。”共产国际的指示信虽然也提出了“巩固并扩大游击战争”,但是把它作为“革命潮流之中的一个支流”。很明显,共产国际看重的是城市工人的斗争,而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的游击战争只是一个配角。

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930年1月作出了《接受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将发动城市的同盟罢工作为党的重要工作。在此方针下,1930年初,上海、唐山、青岛、武汉、厦门等大城市的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了同盟罢工或飞行集会。这些“左”倾错误又继续发展,到1930年6月中旬,最终形成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由于当时国民党强化对工人区域的统治,其戒严条例规定禁止集会、罢工,违者处死;并派军警驻厂,以密探、工头监视工人,党不顾客观条件用冒险的方式开展工人运动非常困难,并受到严重损失,一些党组织和赤色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工人积极分子被敌人杀害。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回忆,1930年4月至9月的半年中,仅江苏省被国民党杀害的党员、好群众就有3130人,1480人被捕。与此同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等十几个省委机关

先后被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城市工人运动严重受挫，而不被共产国际看好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却得到迅速发展。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挺进赣南、闽西，到1930年春，包括兴国、于都、宁都、瑞金、赣县、安远、寻乌、信丰、南康等县的赣南根据地和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等县的闽西根据地初步形成。1930年3月，赣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曾山、邓子恢分别担任主席。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和闽西的红十二军及赣西南的红六军合编为红军第一路军，接着又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后来，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成的红二十军和红二十二军也划归红一军团建制。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创建，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对各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

再看其他根据地，红五军1929年5月由赣南返回湘赣边界，与地方革命武装一起开展武装割据。至年底，在宁冈、莲花、永新、遂川、泰和等县恢复和重新了地方革命政权。1930年1月，中共赣西特委成立。后来，赣西和湘东根据地连在了一起，成为湘赣根据地。

1929年8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由湘赣边界返回湘鄂赣地区。到1930年四五月间，红五军已发展到5000余人，在湘东北的平江、浏阳，赣北的修水、铜鼓、万载，以及鄂东南的大冶、阳新、通山、通城、崇阳建立起较为巩固的根据地。6月上旬，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五军第五纵队同鄂南根据地的部分赤卫队合编为红八军。同月，彭德怀、滕代远根据中央的命令，在湖北大冶宣布成立红三军团，下辖红五军和红八军，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后来红十六军也划归红三军团建制。湘鄂赣根据地是当时一个比较大的根据地之一。

在湘鄂西，在贺龙、周逸群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斗争，先后建

立了湘鄂边和洪湖两块根据地，成立了红四军和红六军。1930年7月，湘鄂边的红四军和洪湖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红军第二军团（红四军同时改称红二军）。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兼前敌委员会书记，全军团约1万余人。

在鄂豫皖，当地党组织经过斗争，先后建立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1930年4月，上述三块根据地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2月和3月的指示，组成中共鄂豫边特区委员会，并将原先的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同年6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10月，由阳新地区北渡长江转战到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红八军第四、第五纵队与当地游击队合编为红十五军。这样形成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

此外，在赣东北、广西左右江、广东东江、琼崖等地，红军和根据地也得到较大发展。

总之，到1930年夏天，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余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十多个省的边界地区后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

就这样，不被共产国际看好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角。像大家常说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中国革命的主配角换位的事实，使共产国际也不得不承认，其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也发生重大变化。1930年7月上旬，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指示：“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采取一切措施最大限度地加强红军。现在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和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7月23日，共产国际又给中共中央发出电报，表示“坚决反对在目前条件下在南京、武昌举行暴动以及在上海进行总罢工。”要求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最近的电报指示开展工作，“特别要加强群众性工作和组建红军。”7月29日，共产国际就红军建

设好游击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信。信中除了对红军中党的建设、红军和苏维埃问题作出指示外，还特别强调要建立根据地，指示：要“牢牢占领并保持具有巩固和进一步扩大苏维埃政权的足够政治经济前提的根据地”，“越是迅速地具有这样的根据地，越是迅速地把武装斗争从各种独特的游击战形式转变为正规军作战形式，我们就越能迅速地保证从组织上掌握农民革命运动，就能迅速地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从而保证革命的胜利”。8月8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政治局，更明确地指示：“建立一支坚强的、组织严密的、政治上坚定的、有充分供应保障的红军，是中共工作目前的中心环节”。为此，共产国际提出：“必须选择和开辟能保证组建和加强这种军队的根据地。对根据地的基本要求是：相当程度的农民运动，从容组建的可能性，获得武器的前景保证今后能夺取一个有足够工人居民的大的行政中心的发展前景。目前显然赣南、闽南、粤东北地区首先能够成为这样的根据地”。

共产国际从7月上旬到8月上旬一个来月的时间，连续四次电报指示中国共产党坚强红军和根据地建设问题，就电报的密集程度来讲，过去是没有过的，说明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从共产国际电报的内容看，基本上是正确的：其一是把建立红军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其二是要求把武装斗争的形式从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其三要求加强根据地建设，尤其是重视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建设。其四是反对当时在大城市搞冒险主义的军事暴动和总罢工。可以说，这几个方面基本上符合中国革命发展趋势的，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即将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判断和提出的措施基本上是正确的。

那么，在武装斗争即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时，对红军危害最大的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1930年5月上旬，爆发了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中原大战和李宗仁、张发奎在粤桂对蒋介石集团的战争。李立三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总的形势，

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中国革命将会在这一最后决战中取得完全胜利。在这个错误思想主导下，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李立三虽然认为在农村组织红军是必要的，但认为红军的任务是与城市武装暴动配合。他虽然要求改变过去的游击战术，但不是以巩固扩大根据地和红军为目标，而是要求武器简陋的红军打进攻战，去攻打敌人防守力量很强的中心城市。规定红三军团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逼武汉；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九江，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红二军团、红一军相互配合进逼武汉；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和广州。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 8 月 23 日在浏阳永和市会师后，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共 3 万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9 月，红一方面军再度攻打长沙未克后，毛泽东和朱德带领部队撤离长沙。部队到达袁州（今宜春）后，毛泽东说服前来传达回攻长沙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决定既不回长沙，也不攻南昌，而是攻打周围都是革命根据地的孤城吉安。10 月 4 日，红一方面军打下吉安，后又占领附近许多县城，使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在赣西南控制的地区一时扩大到 30 多个县，红一方面军发展到 4 万人。

尽管在毛泽东的抵制下，红一方面军没有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但并不等于红一方面军内和江西地方党组织内对这个问题意见一致，仍有一些人有革命的急性病，要求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因此，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仍是红一方面军适应新形势、转变军事斗争方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发展和壮大红军的主要障碍。从思想上清除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是红一方面军的当务之急。

在对付国民党敌军方面，红一方面军将面临的是蒋介石即将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红军和根据地趁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得到较快发展，特别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命令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的震惊。1930年10月，历时近半年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一口气任命14个“剿匪”督办，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与以往由一省或几省对红军的“进剿”、“会剿”不同，是由蒋介石统一调动全国的反革命军事力量对红军进行“围剿”，企图在3至6个月内消灭红军。因此，革命根据地面临的形势空前严峻。国民党军“围剿”的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

10月20日前后，蒋介石将其第七十七师、新编第五师、第五十师、第六路军第二十四师、第八师分别由湖南、河南调入江西，连同原驻江西的新编第十三师、独立第十四旅，共7个师又1个旅。另外又令在武汉休整的第十九路军装备进入江西。蒋介石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上述部队。

国民党重兵滚滚入赣，目标直指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如何打破国民党军前所未有的军事“围剿”，保卫赣南、闽西根据地，鼓舞广大党员、红军指战员、苏区群众和革命人民的信心，推动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发展，是毛泽东、朱德、江西地方党组织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时，新接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的米夫就对红一方面军能否打破国民党军队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捏一把汗。他认为在国民党军的优势兵力下，赣南、闽西苏区处境恶化，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很小。米夫在12月2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一方面认为反“围剿”胜利“并不是没有希望”，另一方面又说“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在敌人优势

兵力的压力下,我们将暂时撤离这个地区”。至于“是保卫苏区直到最后一个红军战士,还是挽救红军”,米夫认为“比较合适的做法,当然是后者”。为此,他要共产国际考虑:“我们撤退到什么地方为好,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地区作为新的根据地,并继续解决组建红军的问题。”他的意见是:“老的地区位于三省交界处,朱德和毛泽东已在那里坚持了两年多,这个地区未必合适……以前朱德和毛泽东率领一支不大的队伍能够在这个山区作战,而现在,当谈到要形成一个有力的红军拳头的时候,该地区以前的优势就会成为完成这项任务的障碍。另一方面,远离发达的其中运动的地区也是不合适的。”然而,究竟哪里建立新根据地比较合适,米夫也没有拿出个意见来。这说明,米夫对红一方面军能否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军事“围剿”没有信心。可以说,米夫是主张红一方面军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始作俑者。

我在这里讲了这么多,只不过为了说明,罗坊会议是在红军、根据地发展以及第一次反对国民党以举国之力发动的军事“围剿”的历史节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它关系到红一方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命运,也关系中国革命的走向。

二、罗坊会议的历史作用

我认为,罗坊会议的历史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思想上清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红一方面军江西地方党组织的影响。

李立三提出的最著名的“左”倾口号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个口号听起来确实鼓舞人。当时,党内有革命急性病的人不光是李立三,还有不少其他人。这样难怪,中国革命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在不断受到挫折,不断改正和纠正错误中找到规律的,是在探索中前进的。当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新军阀发生混战,红军得到壮大、根据地得到发展,特别是主力红军发展,有了点本钱。党内一些同志就产生了错觉,国民党、蒋介石快完

了,中国革命很快就要取得全国胜利了。

思想上的问题,必须通过正确的思想工作方法来解决。罗坊会议从思想是清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主要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正确估量新军阀之间的矛盾。罗坊会议文件(《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分析了蒋阎冯之间的矛盾后,指出:“长沙占领与继续的严重进攻,以及吉安夺取,这不但使中国革命势力有广大的转变,同样也转变了统治阶级的关系。”认为革命力量的发展,威胁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时候,它们便想缓和自身的冲突,转而过来联合对付革命。不仅是美帝国主义感觉如此,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也觉中国革命胜利对它不利,因而暂时同美国妥协。在英帝国主义方面,也是把镇压中国革命放在首位。由此,罗坊会议文件判断,“在帝国主义军阀这一暂时联合对革命之下,所以蒋介石有从前线大调兵力进攻国民党需要与可能。”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十分正确的。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对新军阀之间的矛盾估量过高。罗坊会议文件指出:党内对于军阀混战有两种不正确的估量:一种是空洞乐观估量,认为军阀混战总是愈打愈大,无论如何不会联合对付革命。这种估量是不了解阶级的矛盾超过统治阶级自身矛盾时,统治阶级必然要作最后挣扎,暂时抛弃自身的矛盾联合起来,对付革命。另一种是以为联合对付革命,革命就遇到很大困难,因而产生悲观情绪。文件要求反对这两种观点。

二是总结攻打长沙的经验教训,说明为什么不打南昌。罗坊会议的文件认为,第一次攻占长沙后不能持续占领,主要是群众条件不具备,在力量上也不是红军的中坚。第二次攻长沙,因为仍然缺乏群众条件与敌方士兵的配合,成为单纯的红军的攻坚,所以红军猛攻半月也未攻下来。两次攻打长沙的教训是采取了单纯军事观点的轻装袭击路线。那么吉安为什么攻下了呢?主要是有广大的群众基础,所以能真正夺取。罗坊会议文件认为,第一次攻长沙

得手,是因为敌人无援兵可增,无工事可守。也只有这样的条件,轻兵袭取才有可能。现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情况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况且红军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是无法攻下的。因此,必须纠正轻装袭击的游击观点。攻打南昌必须在红军的力量、装备、群众等条件都具备时才行,先攻打吉安,为的是为以后攻打南昌创造条件。

通过摆事实,认真分析,说明道理等方法,从思想上清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红一方面军和江西地方党组织的影响,对于此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进行反“围剿”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正确作战方针。

在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当时敌情的变化,明确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目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

毛泽东的主张在讨论时,一些同志不赞成,如李文林、袁国平认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这些同志主要是受到“左”倾冒险的“进攻路线”的影响,不肯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讲进攻,把退却到根据地避开,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的民众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看做是“保守路线”。还有一些同志,担心退却会使群众的“坛坛罐罐”会被敌人打烂。

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多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反复讨论,对不打南昌形成一致意见。但对于“诱敌深入”方针仍没有取得统一认识。10月30日,从侦察得知,国民党

多路军队约10万人已经出动,气势汹汹向根据地扑来,局势十分严峻。毛泽东立即召集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出发,要打破敌人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才有可能,于是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由于实行了“诱敌深入”的正确作战方针,红一方面军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诱敌深入方针的提出和实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成为红军的重要作战原则,更重要的是保卫和发展了中央苏区。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央苏区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命运。试想,如果第一次反“围剿”失败了,那么中央苏区将不复存在,红一方面军将向何方,不得而知。中国革命的胜利推迟到何年,不得而知。正是因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了,不仅是保住了中央苏区,锻炼和壮大了红军,积累了经验,更重要的是鼓舞了士气,提高了战胜敌人的信心,推动了中国革命发展。后来,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云集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苏区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摇篮,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功不可磨,而这一切又得益于罗坊会议制定了正确的“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方针。

前面说过,共产国际驻中国上海的运动局书记米夫对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军事“围剿”信心不足,捏一把汗。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下,从1930年11月初到12月底止,消灭了国民党军一万三千人,干脆利索地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军事“围剿”。1931年2月10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组负责人盖利斯向上级别尔津兴奋的报告:“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几乎收复了自己原有的阵地”,“粉碎了对我们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蒋介石关于消灭苏维埃运动的种种期限都已成为泡影。”认为反“第一次围剿”的结果,我们的部队大大增强了……上海的情绪也高涨了”。“第一、第三军团大大改善了自己的物质状况。”

有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才有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威信，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是在指挥反“围剿”，创造和发展中央苏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式道路中奠定的。

第三，加强了红一、三军团的团结。

红一方面军是由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而成，是属于两个山头，两个山头合为一个山头，自然是需要一个磨合期的。红三军团原先活动在湘鄂赣根据地，其第五军和第十六军大多数是湖南平江、浏阳人，第八军大多数是湖北阳新、大冶人。其中一些人地方观念，在罗坊会议上，三军团有人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于赣江以西。彭德怀坚决支持总前委的决定，认为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德、毛泽东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彭德怀在三军团的会上说：“要集中兵力，大量地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他批评了有地方主义的同志，说：“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红一、三军团统一行动，对反“围剿”是非常重要的。集中行动，才能形成一个拳头。在国民党重兵压境的情况下，红军展开运动战，寻找战机，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在战斗中集中兵力，形成局部的兵力优势，进行速决战，迅速歼灭一部分敌人，从而打破敌人的“围剿”。如果兵力分散，没有将这部敌人快速消灭，其他敌人就会很快围上来，红军反而处于不利地位。在此后的无论是反“围剿”还是红军长征，红一、三军团都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指挥作战考虑的战略力量和军事基础力量。红一、三军团集中使用，则容易打胜仗，分则容易打败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红一、三军团分开使用，丧失了不少有利战机。

第四，积极布置动员群众参战扩大苏维埃。